

透過 COVID-19 謠言來看常民如何看待疾病與

謠言

程一禾*

摘要

近年來，新媒體依託其強大的技術支撐而橫空出世，其涉及領域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成為輿論形成與發展的一大推手，在輿論引導中表現出不同於傳統媒體的積極作用。但近年來，新媒體在輿論引導中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如何揚長避短，正確提升新媒體的輿論引導能力，已成為無可迴避的重要議題。

本文將案例背景設定在於2020年爆發的全球性疫情新型冠狀病毒下，是因為對於絕大多數民眾而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近年來與自身關係最為密切的一次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也是情緒蔓延時間最長，波動最為劇烈的公共事件。

本研究期在連結謠言與疫病二者之關聯，以COVID-19相關之謠言作為文本分析對象，對其進行解讀，並挖掘謠言背後所反映出來的常民在COVID-19疫情下的真實訴求。

關鍵詞：新媒體、謠言、COVID-19、輿論

*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研究所碩二學生

Through rumors in COVID-19 pandemic to analyze how people think about the rumors and disease

Yi-He Cheng*

Abstract

Relying on its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new media has emerged in the last decades, and its fields have penetrated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the new media have become a major driver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 It has shown a different positiveness from traditional media in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new media also have shown obvious limitations in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How to maximize the strengths and avoid weaknesses, correct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new media to guide public opinion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important issue.

This article se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case to be under the global pandemic of the new coronavirus in 2020, because for the most majority of people, the new COVID-19 pandemic may be the most closely related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 recent years. It is also the public event with the longest mood affected and the most violent fluctuations.

In this research, we connect rumors and epidemics, analyzing rumors related to COVID-19, interpreting and digging out the true demands of ordinary people under the COVID-19 epidemic that are reflected in the rumors.

Keywords: rumor, COVID-19, new media, public opinion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壹、研究背景

從2019年末至今，對於中國大陸乃至於整個世界而言，一個無可迴避也是影響最為劇烈的事件莫過於COVID-19（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大流行。冠狀病毒對於人類社會而言其實並不陌生，曾經肆虐全球的MERS（中東呼吸綜合症）和SARS（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等嚴重傳染性疾病都屬於冠狀病毒家族，而2019年末於中國武漢市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是之前從未在人體中發現的冠狀病毒新毒株。

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地區出現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發病，中國武漢市對此持續開展流感及相關疾病監測，發現病毒性肺炎患者27例。武漢一位名為李文亮的眼科醫生於2019年12月30日在網路上發布關於華南海鮮市場的疫情信息，稱該地出現SARS病患，作為本次疫情的「吹哨人」率先向外界發出防護預警，這則訊息在網絡上傳播廣泛，但在當時被認定為謠言。同日，武漢衛健委發布通知稱武漢市內部分醫療機構陸續出現多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隔日國家衛健委派專家組抵達武漢指導疫情，儘管當時新聞有所報導，但民眾不以為然，並未放在心上，然而隨著確診病例的不斷增加，面對未知疫病導致民眾間的惶恐情緒開始上升。1月20日晚，央視《新聞1+1》節目連線時任專家組組長鐘南山院士，新冠肺炎被證實為有人傳人現象。2020年1月23日，也就是農曆新年二十九，武漢突然宣布封城，這一前所未有的舉措直接刺激了民眾心中對於疫情的恐慌程度。除夕夜時，全國累計確診830例，單日新增259例，同日，武漢專門設立為收治新冠患者的火神山醫院開建，預期十天完成，在建造期間很多民眾通過網絡直播觀看醫院建造過程，也算是在疫情的恐懼之下得到了略微喘息的空間。另類的春節，全國人民啟動「居家封閉式隔離」，「口罩」成為新年關鍵詞。1月28日，來自全國各地的醫療隊共6000人支援湖北，眾志成城，阻擊疫情。截止到2020年1月31日，中國累計確診11791例，一日新增2102例，累積疑似17998例，且當日美國也出現首例人傳人案例，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2020年8月，有關研究指出新型冠狀病毒具有高傳染性和高隱蔽性的傳播特徵。12月23日，英國發現了另一種傳染性更強的變異新冠病毒，2021年1月15日，英國再次發現另一種來自巴西的變種新冠病毒。2月21日，在印度各地發現了多達240種新型冠狀病毒毒株的變種。3月30日，中國-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報告在日內瓦發布，報告中指出，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並非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最初來源地。

然而疫情發展至今，全球仍處於混亂之中，絕大多數國家的疫情並未得到

控制，甚至有持續擴散失控的勢頭。截至2021年5月20日，全球累計確診病例165711111例，累計死亡病例3428951例。在醫療條件接近崩潰時，不僅無法及時醫治已感染的病患，也無法釐清感染源及時隔離阻斷，甚至在印度等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連遺體都得不到合理處理，加之新冠病毒毒株不斷出現變異，疫苗數量亦無法跟上需求，種種困擾使得全球的新冠疫情仍然處於嚴峻局勢。疫情所帶來的危機不僅限於威脅民眾的生命安全，也對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國際交流等等造成了相當程度上的衝擊。

在面臨COVID-19帶來的恐懼與挑戰時，民眾和社會用何種方式，以及如何對此疾病做出回應，新媒體都展現出不同於傳統媒體的特徵，在民意的展現面前較官方媒體而言更為真實。但從近年來的一些案例來看，新媒體在輿論引導中亦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和不確定因素，假新聞頻頻出現，傳播範圍之廣，速度之快，已經成為紛擾輿論的發端，加之現在新媒體的產製門檻低，並且缺乏制度化的監管機制，盲目追求時效，追求吸人眼球，甚至忽視真相的存在，歪曲事實，炒作真相，使得互聯網中摻雜著許多偏激的、甚至極端化的內容，創作者為了謀求不當利益，使其傳播的一些信息產生了不良的社會效果，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公共輿論的扭曲。因此，如何辯證地看待新媒體在輿論引導中的積極和消極作用，如何揚長避短，正確提升新媒體的輿論引導能力，共同建構和諧的輿論環境，已成為無可迴避的重要議題。

過去學者多以謠言研究為主，藉由回溯過去謠言的相關研究，從謠言的產生、特性、傳播方式、效果等層面，可以更了解事件的現象。本研究期在連結謠言與疫病二者之關聯，以COVID-19相關之謠言作為文本分析對象，對其進行解讀，並挖掘謠言背後所反映出來的常民在COVID-19疫情下的真實訴求。

貳、文獻綜述

一、謠言之相關研究

(一) 謠言之定義

關於謠言的定義向來眾說紛紜，心理學、社會學、傳播學對此都有其不同的定義，儘管如此，學者對於作為傳播媒介的謠言仍存在某些共同的認識。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謠言指的是沒有相應事實基礎，卻被捏造出來並通過一定手段推動傳播的言論。受眾未被明確或暗示虛構的前提下，被捏造及傳播的與事實不同甚至相反的言論，即為謠言。

學者Knapp指出，謠言是一個參照當前時事、旨在使人相信的命題，在未經官方證實的情況下廣泛流傳。(Knapp, 1944) 而Peterson & Gist (1951) 認為謠言是一種在人與人之間流傳的，對公眾關注的事物、事件或問題的未經證實的敘述或闡釋。另有學者卡普費雷定義謠言是在社會中出現並流傳的未經官方公開證實或者已經被官方闢謠的信息。(卡普費雷, 1991)

儘管說法各有不同，但從上述學者關於謠言的代表性定義的總結中可得知，謠言首先是一種信息或命題，它賦予與現實有關的某人、某事或某個條件一些新的因素，其次，謠言是口傳的，且未經證實，最後謠言的目的是為了使人相信。

(二) 謠言研究之歷史脈絡

謠言是最古老的傳播媒介，也是新媒體事件中常見的傳播現象。在出現文字之前，口傳媒介是社會唯一的交流管道。學者胡泳指出，現代對謠言的首次系統研究起源於二戰時期的美國，美國謠言控制學說的代表人物納普分析了在二戰期間流行的超過一千條的謠言，認為謠言是社會失序的一個結果，是社會態度和動機的一種投射。

受惠於納普的經驗分析，奧爾伯特和波斯特曼對於謠言的起源和散播進行了第一次科學的解釋，他們把謠言視為一種更加日常的行為，即在戰爭中也在和平年代出現。(胡泳, 2009)

有關謠言的研究一直被兩股力量所撕扯：一種觀點認定謠言是信息衰減的機械產物，另一種觀點堅持用心理分析的角度看待謠言。學者澀谷保將謠言看成一個群體對所面臨的問題和矛盾的解釋，謠言是社會集體信念的反映。學者卡普費雷在澀谷保的基礎上，強調謠言的「非官方」性質：「謠言並不一定是“虛假”的；相反，它必定是非官方的。它懷疑官方的事實，於是旁敲側擊，而且有時就從反面提出其他事實，這也是大眾媒介未能消除謠言的原因。」

(三) 謠言存在之條件

學者奧爾伯特和波斯特曼整理出一道關於謠言的公式：謠言= (問題的) 重要性* (事實的) 模糊性。

重要性和模糊性是謠言的兩個必要條件，兩者是相乘的效果，缺一不可，如果一則謠言的重要性或模糊性是「零」，那謠言就不可能流傳。此外，具有新聞價值的謠言才能夠被散布。Allport & Postman (1947) 就指出，公共事件如果

沒有新聞價值，那就不可能會孕育出謠言。另外，在某些情況下，若新聞對某起事件越顯著的關注，特別是重大事件，越可能產生大量的謠言，或是一系列扭曲新聞事實的謠言。（杜兆倫，2018）

（四）謠言出現之場域

學者胡泳總結了謠言出現時的三種情形，

1. 如果在一種社會秩序中，信息被當局嚴密控制，謠言就會非常激烈。
2. 當發生的事件威脅了正常生活的時候，例如大的災難或醜聞發生，或者在一個社會中潛在的衝突對象或互相競爭的群體之間原有的適應和妥協被打破。
3. 假如對一個有力的共同行動的推動受到阻礙，謠言也會生發出來。

學者斯科特在觀察抵抗的政治時意識到，在沈寂不動和激烈反抗之間還存在著一個廣大的中間區域，謠言正是中間地帶的抵抗中一種有力的手段。（胡泳，2009）因此，作為「反權力」的謠言，便打破了過往學者一貫認為的認知，成為一種社會抗議的存在。

（五）謠言的困境

在中國語境中，謠言幾乎一邊倒地被視為沒有事實根據的惑眾之言，學術視野的逼仄是造成和助長這種局面的原因之一，在學術研究上，謠言與負面、虛假掛勾。

學者周曉虹主編的《社會心理學》指出：「根據傳言製造者的動機不同，傳言可以細分為流言和謠言，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屬於無意識傳播，後者則是有目的地捏造，一般懷有惡意，為的是造謠生事。」

國內學者談謠言時多強調「動機」，即特定意圖，在謠言定義過程中的情感色彩進一步強化，也喪失了學術的中性。將「動機論」應用在謠言上，極其容易將謠言塗抹上倫理色彩。

（六）謠言作為一種社會抗議出現

學者胡泳提出與大多學者不一樣的看法，他反對將謠言定性為「虛構」、「捏造」、「誹謗」，而是認為謠言常常作為一種社會抗議出現。謠言既是社會現象

，也是政治現象。謠言構成了一種反權利，即對權力的某種制衡。

學者澀谷保將謠言過程視為社會生活中一個正常的而不是病態的部分，他將謠言設想為一種集體行動，澀谷保強調謠言總是處於「不斷的建構」中，謠言內容的變化不僅是對信息的歪曲，而且是達成一致的過程的一部分。這修正了謠言的負面形象，而是將謠言看成是理性行動的一種形式。（胡泳，2009）

學者周裕瓊也提到說，「每則謠言都有多個版本，或前後呼應或交相輝映，一個版本被否定，另一個版本就會起來；在一則謠言被徹底澄清之後甚至之前，替代品或補充品已然應運而生。如此延綿不絕、生生不息，讓人不得不驚歎這一看似無組織的集體造謠傳謠運動背後靈活深刻的集體智慧。」（周裕瓊，2008）

二、 學者關於傳染病時期謠言之相關研究

學者周曉虹在《傳播的畸變——對“SARS”傳言的一種社會心理學分析》中以2002年肆虐全球的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即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病毒或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2003年2月10日至5月20日的與SARS病毒流行及公眾反映相關的新聞報導和市民與專家訪談，並針對普通居民與學者進行相關深度訪談，在回顧了SARS發展過程後，周曉虹在解讀了SARS傳言之所以流行的社會成因後，指出SARS病毒對於公眾的重要性並不單單取決於對其生命的危害程度，也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它的不可控性。個人的心裡與行為、傳播過程中的再造，以及民間傳統與信仰，都可能使SARS傳言內容發生歪曲，並最終使其發生畸變。其中特別提出對於謠言的接受程度與接收者或傳播者的文化水平與認證層次有關，在對比了SARS肆虐期間北京、廣州等地流行的現代都市傳言和前述14個省的鄉村及小城鎮地區流行的民間傳言後發現，由於民間傳言大量借用了包括民間信仰和民俗行為在內的傳統因素，使得SARS傳言的畸變更為突顯。

在《謠言、大眾傳媒和國家價值取向——一項對中國愛滋病敘事（2003-2009）的話語分析》一文中，學者楊慧瓊用話語分析的方法，分析了2003至2009年大陸傳媒有關愛滋病的報導，試圖揭示愛滋病話語和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筆者首先綜述了自1987年到2003年中國愛滋病敘事的歷史變化，以2000年為分水嶺，此後媒介敘事雖然在面貌上有大的變化，內在結構上卻延續了2000年之前的道德化立場、我們／他們的立場，遙遠的他者變為內部的他者，這構成了媒介敘事中的愛滋病文化模式，且與常民敘事中的謠言不謀而合。作者指出，面對愛滋病，人們在交換最基本的看法時，會發現彼此之間的感受很相似，在此意義上，原始恐懼不僅僅是個體的，而是轉變為社會性的。謠言首先

標記的是社會恐懼。從這點上來看，關於愛滋病的謠言是許多人心理上感受的疾病威脅的產物，它首先表達的是普遍存在的恐懼、與對恐懼所引起的焦慮的舒緩和釋放。作者提到關鍵的一點是在媒介敘事中，存在着一種愛滋病文化模式，而這個模式中的價值觀是中國文化中對一些生活方式、謀生方式、道德的禁忌，隨之而來的是把愛滋病當作應當受到懲罰的罪，而不是疾病本身，感染者／攜帶者由此被構建成生活在我們中間的他者。24年來，中國媒介敘事面向一般人所界定的愛滋病、感染者／攜帶者的社會文化意義，已經對百姓敘事具有涵化作用，而對於愛滋病患者的看法，在百姓敘述中也常常受到文化背景和日常經驗的影響。

學者殷曉椿在《基於新媒體的疫情謠言傳播個案研究》一文中，選取了在新媒體環境下，自2003至2014年中國大陸發生的較為重大疫情事件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較大社會影響力的疫情事件作為研究對象，針對疫情謠言內容、疫情謠言傳播媒介（新媒體）、疫情謠言傳播者以及新媒體疫情謠言傳播因素進行研究，得到新媒體信息質量具有內容碎片化、體驗立體化的特點，新媒體信息傳播具有發布零滯性、能擴大信息傳播速度和範圍的特點。而新媒體所具有的這些信息傳播特點，使得新媒體有利於疫情謠言的產生，亦可提升謠言的可信程度，有利於謠言的傳播，並弱化了政府部門對於謠言的控制力度。

另一個關於傳染病時期的污名化現象也被學者所重點指出，如施誠、倪娜在《西方學術界重大傳染病起源地研究的歧見和偏見——以黑死病、美洲天花、梅毒和1918年大流感為例》一文中，提到歷來西方學者在傳染病這方面對於亞非拉地區或國家，特別是針對中國的污名化現象尤為嚴重，帶有偏見的將其視為是病毒的起源，例如認為1918年爆發的大流感是由於中國人喜歡與動物緊密接觸，有學者認為中國人飼養、食用甚至與動物共處一室的習慣是導致大流感爆發的重要原因，但事實上這一論證缺乏可靠史料，罔顧歷史事實，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種族歧視的歷史遺留問題。

綜上文獻所述，針對傳染病及相關謠言的研究，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中都指向民俗療法、個人經驗以及階級鬥爭與社會抗議。代入此次新型冠狀肺炎事件，由於疫情的發展超出人們預期，失去了固有的安全感和穩定感，自我保護的概念異常強烈，關於治癒或預防新冠肺炎的商品謠言層出不窮，在官方未能給出明確治療方案以及預防方法時，民眾在極度恐慌下，也喪失了應有的理智，因應個人文化背景，選擇遵循民間傳統與信仰對抗疫情，而面對公信力下降的傳統媒體，新媒體作為另一種發聲的方式，在揭露事實的同時也使得謠言存在進一步發酵的可能。

參、研究問題

受到文獻綜述的啟發，本研究選取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期間所出現的與COVID-19相關的，傳播範圍較廣且滲透程度較高的謠言作為研究對象，提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問題：

- 一、收集自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期間所出現的與COVID-19相關的謠言，梳理其出現的時間線並對於其內容做歸納分類。
- 二、對相關重要謠言做文本分析，並拆解其背後的深層意涵，進而探究常民如何看待疫病與謠言的關係。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本分析法為主要研究方法，文本分析法是指從文本的表層深入到文本的深層，從而發現那些不能為普通閱讀所把握的深層意義，文本分析能協助我們釐清意義如何被建構以及真實如何被再現。

本文選擇自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期間所出現的與COVID-19相關的謠言作為文本分析對象，對其進行解讀，藉此完整探討在COVID-19疫情下對於謠言文本意義的整體建構過程，以及身處疫情中的常民如何看待謠言這一現象的蔓延，挖掘謠言背後所反映出來的常民在COVID-19疫情下的真實訴求。

伍、分析

一、 COVID-19謠言的發展日程

序號	時間	謠言
1	2020-01-27	新型肺炎是SARS進化版
2	2020-01-28	吃藥能預防冠狀病毒
3	2020-01-28	喝酒能抵抗冠狀病毒
4	2020-01-28	淡鹽水漱口能預防冠狀病毒

序號	時間	謠言
5	2020-01-28	用過的口罩需要剪碎後丟棄
6	2020-01-28	吸菸能預防冠狀病毒感染
7	2020-01-28	病毒只通過呼吸道傳播
8	2020-01-28	熏醋可以殺死冠狀病毒
9	2020-01-28	冠狀病毒感染一定會發熱
10	2020-01-28	醫用口罩預防感染需要反戴
11	2020-01-29	人大附中家長傳染千餘人
12	2020-01-29	嬰兒不會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13	2020-01-29	普通人戴口罩必須一次一換
14	2020-01-30	貓狗會傳播新型冠狀病毒
15	2020-01-30	新型冠狀病毒只感染中國人
16	2020-01-31	新型肺炎治癒後不會再感染
17	2020-01-31	世衛組織宣布中國為疫區
18	2020-02-01	雙黃連能預防冠狀病毒感染
19	2020-02-02	雪中容易帶有新型冠狀病毒
20 (已證實)	2020-02-02	新型病毒可通過糞-口傳播
21	2020-02-03	孕婦感染病毒需要流產
22	2020-02-04	病毒在體外存活不超過一天
23	2020-02-04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居多
24	2020-02-05	已有確切抗病毒藥物被發現
25	2020-02-06	沒有症狀的人(無症狀感染者)不會傳播病毒
26 (未證實)	2020-02-06	未戴口罩15秒即可被傳染
27	2020-02-07	瑞德西韋確證對抗病毒有效
28	2020-02-10	新型冠狀病毒屬於SARS病毒
29	2020-02-12	武漢焚燒屍體二氧化硫爆表
30	2020-02-15	核酸檢測陽性就是確證病例
31	2020-02-16	空氣淨化器可以過濾病毒

序號	時間	謠言
32	2020-02-17	第一例新冠來自病毒研究所
33	2020-02-18	西城區因確診新冠導致停擺
34	2020-02-20	病毒容易穿透衣物造成感染
35	2020-02-24	武漢開放外地人員出城
36 (未證實)	2020-02-25	新冠肺炎是全球性流行病
37	2020-02-26	消毒措施越多越好
38	2020-02-27	疫情期間不應接種疫苗
39 (未證實)	2020-02-28	治癒出院複查陽性也會傳染
40	2020-03-03	方艙休艙是疫情已被控制
41	2020-03-04	蚊子會傳播新冠病毒
42	2020-03-06	禁止口罩及原材料出口
43	2020-03-09	狗能感染新冠並傳染給人
44	2020-03-20	出院複陽患者造成傳染
45	2020-03-24	援鄂疾控隊暫緩撤離是反彈
46	2020-04-09	無症狀感染者不需要隔離
47 (未證實)	2020-06-13	三文魚會感染新冠病毒
48	2020-06-23	薯片會傳播新冠病毒
49 (已證實)	2020-07-02	三文魚會感染新冠病毒
50	2020-07-03	咽拭子陽性代表確診新冠肺炎
51	2020-07-03	新冠病毒變異後毒性更強
52	2020-07-12	海峽會感染上新冠病毒
53	2020-07-27	康復後的新冠患者沒有傳染性
54	2020-08-03	蚊子會傳播新冠病毒
55	2021-01-03	雪中容易帶有新冠病毒
56 (已證實)	2021-01-04	未戴口罩15秒就會傳染
57	2021-01-09	治癒出院複查陽性也會傳染
58	2021-01-12	新冠感染康復者，就不需要接種新冠疫苗

序號	時間	謠言
59	2021-01-13	接種新冠疫苗會留下後遺症
60	2021-01-16	新冠滅活疫苗技術落後
61	2021-01-17	接種新冠疫苗後不需要戴口罩
62	2021-01-18	新冠疫苗可以一次打兩針

註：由於人口眾多，互聯網更新速度快，也有些謠言太過薄弱，出現沒多久就不攻自破等等因素，因此無法準確收集全部於COVID-19疫情時期產生的謠言，所摘錄謠言來自支付寶阿里健康平台中抗擊新冠肺炎專題中的闢謠專區，由支付寶阿里健康平台與健康報聯合發布，國家衛生健康委宣傳司指導發布，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是中國國務院組成部門，是中國政府權威機構，因此具有相當程度的公信力。

二、謠言之歸納分類

（一）謠言的頻率

從謠言傳播的密集程度來看，在疫情剛爆發時期，謠言出現的頻率最為頻繁，在彙整的62條謠言中，一月僅五天時間，共產生謠言17條，二月共計產生22條，三月共計產生6條，四月共計產生1條，六月至12月之間中國大陸的疫情形勢已經趨緩，國內基本已經控制住疫情，此時謠言出現的頻率大大降低，共計產生8條，而到2021年1月則共計產生8條。

（二）與SARS相關的謠言

通過第一則謠言我們能夠了解到，民眾在最開始接觸到肺炎、傳染病這幾個關鍵詞時，不可避免的首先聯想到近些年唯一有所經歷的2003年非典SARS病毒，認為是SARS病毒捲土重來，甚至更為嚴峻，但事實上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已闢謠稱，僅管COVID-19和SARS在進化上離的比較近，但並非SARS的進化版，而是一種全新的病毒。

（三）與常見的方法預防新冠相關的謠言

1月份時產生的絕大部分謠言（第2條、第3條、第4條、第6條、第7條、第8條）有一個較為明顯的共同特徵，核心信息也基本相同，即通過一些常見的方法能夠預防新冠肺炎，例如喝酒、吸菸、用淡鹽水漱口等，這些謠言在現在看來非常離奇，甚至缺乏基本的判斷力，但在當時卻經常傳播於微信群組，通過

群組間轉發的形式進行傳播，這類型的謠言生成更新的速度快，但同樣也很快就得到專家的闢謠，這背後反映出的是在疫情初期，普通民眾由於缺乏相關經驗與知識，對於此類謠言缺乏冷靜的判斷力，以及面對突如其來且來勢洶洶的疫情有本能且未知的恐懼，希望通過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規避風險。

（四）與口罩相關的謠言

1月28日和29日以及2月6日，出現的四則謠言（第5條、第10條、第13條、第26條），都出現了一個關鍵詞，即口罩，這四則謠言的出現與當時口罩極其短缺的情況也有一定關聯，普通民眾家中常備口罩的比例並不高，就算有準備也不會有太足夠的量，而當時疫情突然爆發，而1月底時正值過年，絕大多數快遞都暫停了，要通過網購口罩也變得很困難，因此民眾只能通過藥店去購買口罩，但藥店的正常儲備量也遠遠供不應求，再加上由於過年工廠放假，工人回家過年，口罩的生產供應鏈也因此斷裂，無法跟上短期內如此大規模的需求。在突發的疫情面前，口罩可謂是最簡單也是相對普通民眾而言能夠自我保護的最好方式，當時也出現了離奇的價格漲勢，藥店裡一片原價5-8人民幣的N95口罩甚至被賣到30-50人民幣不等，不僅限於N95口罩，就連普通的一次性醫用口罩都非常緊張，為了滿足需求，許多代購通過從境外採購的方式購買口罩，由於成本和供求關係極度的不平衡，價格也可想而知居高不下，這時關於口罩的謠言出現也有跡可循。

1月28日產生的謠言稱用過的口罩需要剪碎後丟棄，因為在當下口罩極度短缺的情況下，有些不良商家產生了回收廢棄的口罩，進行二次銷售的行為，為了避免病毒傳播，或者買到被污染過的口罩，廢棄的口罩需要剪碎後再丟棄，但這則謠言也很快得到澄清，因為在剪碎口罩的過程中有很高的污染風險，手和剪刀在接觸口罩時都有可能沾染病毒，使用過的口罩應當根據病毒污染的風險選擇恰當的處理方法。1月28日出現的另一條謠言則稱醫用口罩預防感染需要反戴，傳言稱正確配戴外科口罩是保護他人，想保護自己則需要內反過來戴，1月29日產生的謠言稱普通人戴口罩必須一次一換和2月6日產生的謠言稱在浙江省寧波市，一名患者曾在市場內與一名確診患者在同一攤位有過短暫（約15秒）的近距離共同駐留，但這是否是他感染上COVID-19的原因並未得到證實，因為當時這兩個病例的傳播鏈尚待確證，這則謠言直到2021年1月才被證實為真實信息。這些謠言的背後實則反映的是民眾在疫情之下的過度自我保護心態，同樣也不可否認，在疫情期間，的確出現了許多不良商家坐地起價，大發國難財，或許這些謠言的產生，背後也有口罩等防護用品的產業利益鏈的推動。

（五）與對預防病毒的藥物相關的謠言

在2月初時，亦出現了一種謠言的類型（第18條、第24條、第27條），即宣稱某種藥物對於COVID-19有效果，其中最為典型的案例應該是第18條雙黃連能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1月31日晚，人民日報發布微博#雙黃連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該微博發布不久，便迅速登上微博熱搜第一名，甚至帶有「爆」標籤，引發不少民眾線上和線下的哄搶雙黃連熱潮，儘管當時接近半夜，仍有民眾外出排長隊去藥店搶購，這一行為也引起恐慌，認為集聚購藥行為更容易增加傳染風險，線上的搶購風潮則更離譜，因為無法購買到人用的雙黃連，當晚連雞等動物用的雙黃連都被一搶而空，讓人哭笑不得。但從謠言和流言的定義這一角度上來看，人民日報發布的微博並不符合謠言和流言的定義，因為微博原文中有準確的信息來源，也並沒有任何誇大成分——“從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獲悉”“初步發現中成藥雙黃連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目前已經開展臨床研究”。但這則微博的不妥在於沒有對此信息原文進行必要的科學解讀，也沒有考慮清楚信息發佈之後可能產生的一系列後果，從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的原文專報中可以看出，目前關於雙黃連的藥效測試還停留在細胞水平，這種測試的有效性和臨床證明的有效性相去甚遠，而人民日報作為中國影響力廣泛的主流媒體，在發布信息時只是照本宣科，卻沒有對這些關鍵訊息進行科學的解讀，也沒有考慮到在疫情引發的恐慌心理下可能會造成的民眾哄搶的後果。

有學者使用詳盡分析可能性模型（ELM）來解釋這一哄搶雙黃連事件，詳盡分析可能性模型（ELM）是由佩蒂和卡西波於1979年提出的一種勸服模式模型，該理論認為人們在接收資訊的時候有兩種不同的處理資訊的路徑，一種是中心路徑，一種是邊緣路徑。在中心路徑中，人們的判斷主要依靠信息內容本身，人們會持有一種批判的態度，詳細考慮分析資訊論據的質量，最終導致態度的轉變和形成。而在邊緣路徑中，人們則主要依靠感性因素來判斷，會傾向於受到勸服環境的影響（比如資訊發行者的身份），進而改變自身的態度。因此，人們會根據兩點來選擇處理資訊的路徑，一個是資訊接收者個人判斷資訊的能力，二是資訊接收者對於資訊涉及事件的捲入度。

這個模型就可以很好地解讀，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受人民日報的影響哄搶雙黃連。人民日報的微博其實並無不妥，“雙黃連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抑制確實不等於預防。哄搶雙黃連的群眾，更多的是採取了邊緣路徑來分析資訊——資訊來源是中科院藥物研究所、資訊發行者是人民日報、個人缺乏關於藥物研究的相關知識、自身處於極度恐慌的高捲入度狀態中，因此，才會忽視內容本身表達的含義，認為雙黃連是有用的繼而哄搶。

（六）與染病症狀相關的謠言

在疫情發展的初期，也出現了許多與染病症狀相關的謠言（第7條、第9條

、第16條、第20條（未證實）、第23條、第25條、第30條、第46條），例如病毒只通過呼吸道傳播、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後一定會發熱、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居多等等，這些謠言出現的原因可能是由於COVID-19對於我們而言是一種全新的病毒，對其的了解知之甚少，醫護人員在疫情初期只能一邊通過治療一邊進行摸索研究，因此對其傳播途徑、感染症狀等了解的並不全面，由於相關知識的匱乏，也導致了這一類的謠言層出不窮，而新冠肺炎患者以重症居多則可能與當時疫情來勢洶洶，醫療系統缺乏足夠的承載力，導致檢測量遠遠無法滿足，為了緩解醫療系統的壓力，在當時能夠被收治入院進入確診名單的則是相對重症的患者，從而造成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居多的假象。

（七）與無症狀感染者相關的謠言

關於無症狀感染者也是此次疫情中一特殊現象（第25條、第46條），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無症狀的感染者，一般不會出現有明顯的咳嗽，會表現出有輕微的發熱和乏力的現象，所謂的無症狀只是沒有明顯的特殊的症狀，但是和健康的人也會有一定的區分的。雖然說無症狀，但仍會表現出有輕微的不舒服的現象，在發病之前還有密切的接觸史，如果在發病之前的14天之內接觸過從疫區歸來的人員，或者是和從疫區歸來的人員共同乘坐一輛交通工具，比如汽車，火車或者是電梯，這樣就有被感染的幾率。對於無症狀感染者，在疫情初期也並未得到重視，或者說對此不甚了解，防疫抗疫的重心都放在確診的病例上，隨著對無症狀感染者的了解逐漸深入，無症狀感染者本身亦會傳播病毒這件事才被了解，因此關於無症狀感染者的謠言也從不會傳染發展到無需隔離。

（八）與動物相關的謠言

在彙整的47條謠言中有4條與動物相關（第14條、第41條、第43條、第47條（未證實）），猜測這是否與COVID-19病毒源自於動物有所關聯，且中國最早爆發疫情的地方是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與野生動物的違法買賣相關，在疫情之下，民眾對於動物，哪怕並非野生動物也有了相當程度的牴觸程度，認為其與疫情的傳播掛勾。特別在3月4日，香港感染新冠肺炎患者的寵物犬在病毒檢測中呈弱陽性反應，更進一步刺激了寵物會感染新冠肺炎的謠言四起，但3月14日，經由香港衛生署防護中心檢測，狗的病毒測試呈陰性，並未感染新冠肺炎，但這時闢謠的速度已經遠遠趕不上謠言傳播的速度了，當時甚至有主人為了求得“安全感”，丟棄自己的寵物。

（九）與中國相關的謠言

在中國的新冠肺炎爆發時期有一個關鍵的時間點，是2020年1月23日，武漢

發布通告宣布自當日10時起，武漢正式封城，這一前所未有的舉措直接刺激了民眾心中對於疫情的恐慌程度，當時正值過年，民眾重心並未特別偏向疫情，且由於之前政府新聞宣稱該肺炎並不會人傳人，絕大多數民眾都低估了疫情的嚴重程度，也缺乏對於傳染病的了解與真實經歷，2003年的非典SARS疫情也並未給民眾生活帶來如同此次新冠肺炎般的影響，當時交通不像現在發達，人口流動量與速度也遠低於如今，或許是原因之一，諸多因素交雜，也從而降低了人們對於疫情爆發的警惕性。

在彙整的資料中與中國相關的謠言有兩則，分別是1月30日稱新型冠狀病毒只會感染中國人和1月3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將中國劃為疫區。第一則謠言顯然說服力不足，當時已出現多起外國人被感染的確診病例報導，例如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台報導，29日從武漢乘坐包機返回日本的206名日本人中有3人被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至此，日本國內已經確診了11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這一謠言很快就不攻自破，第二則傳言則稱中國被世衛組織劃為疫區，將嚴重影響跨境貿易和旅遊，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而據央視新聞微博，世界衛生組織於1月30日發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強調不建議實施旅行和貿易限制，並在此高度肯定中方的防疫舉措。或許與一些不法分子試圖想趁疫情時期，挑起國內的混亂與矛盾，引發民眾恐慌有一定關聯。

三、 民間醫療行為與新型冠狀病毒之對抗

距離上一次全球範圍內的傳染病SARS（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大流行已經過去將近20年之久，民眾對於致命病菌傳染病的印象已經模糊淡去，從個人經驗而言民眾對於傳染病的知識儲備仍然薄弱，新型冠狀病毒的突然爆發使得民眾措手不及，當科學醫療對於新型毒株仍處於探索階段，無法精準施救時，愈加複雜嚴峻的疫情與因為無法得到及時隔離而導致爆發式增長的感染人群使得民眾的恐懼心理更加嚴重，種種原因促使民間療法興起。當疫病興盛而醫療無從妥善處理時，民間醫療行為越容易出現，而在仔細觀察與之相關聯的謠言後，能夠發現這些所謂的民間醫療行為與個人經驗行為有著深深的淵源。

大部分的民間醫療行為大多屬於無醫學根據的妄言，這也代表民間在這波疫情中，對於醫療相當的混亂。我們能夠從彙整的謠言中看到在疫情爆發的前期是這些民俗療法的謠言產生的高峰期，面對疫情的恐懼，民眾的心理也經歷了從恐懼到參與其中的過程，當疫情從中心武漢燃燒至自己身邊，儘管當時尚未染疫，但無孔不入的病毒和新型冠狀病毒狡猾的潛伏期，如何擺脫病毒的侵害，成了民眾最關鍵的考量。

細究民俗療法的謠言，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種純屬無稽之談，一種則在某些方面存在其合理性，但並不適用於新型冠狀病毒防治。例如用淡鹽水漱口可預防新型冠狀病毒這則訊息，網友大量轉發流傳的說法是鐘南山院士呼籲民眾去醫院或其他公共場所之前用淡鹽水漱一下咽喉部位，在回家後再漱一次，方法是含一口淡鹽水，仰起頭讓鹽水處於咽喉部，微微張開口，讓氣流從咽喉部慢慢呼出，這時鹽水會隨氣流緩緩流動，幾秒鐘之後再將水吐掉，反覆幾次即可。由於病毒或細菌首先通過鼻腔潛伏於咽喉部，淡鹽水可以在第一時間內殺滅它們，從而達到預防感染的目的。這則訊息已經被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闢謠，漱口清潔的是消化道，而冠狀病毒主要是通過呼吸道黏膜侵入人體，因此指望通過淡鹽水漱口來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是不現實的行為。而通過熏醋的作法殺滅新型冠狀病毒的作法，在醫學上醋能夠殺菌的說法實際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5%的普通食醋可以使得一些對酸敏感的食源性致病菌（例如金黃色葡萄球菌、單核細胞增生李斯特菌）的生長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在流感等傳染疾病爆發時期通過熏醋的方式對空氣進行消毒是沒有用的，還可能會引發呼吸道的不適。

在對比了同樣屬於呼吸道傳染病的SARS時期盛行之謠言後，發現關於“食鹽能夠治療肺炎”的謠言在當時就已經出現過，作為一則曾經流傳廣泛又被廣州市政府這一官方平台闢謠後的謠言，在新冠時期再次出現盛行，這也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證明鹽水能夠滅菌這一民俗療法深入人心，在藥石罔效時，遵循老祖宗的話成為了民眾能夠自我保護的重要方式。

在SARS時期流傳的更多離譜謠言，諸如通過“放鞭炮”、“燒香”的作法抵禦病毒，是來自於民間的“避邪”傳統，而在新冠時期也有類似謠言，諸如“燃放煙花可以預防感染”、“丁香醫生說童子尿可以預防新冠病毒”等，在偏遠地區，人們面對醫療落後、理性化不足的情況，仍然存在這些怪力亂神的思想，將人生的命運、重要的抉擇，特別是在面臨重大災害時，將希望寄託於神佛，或將一些無法更改的事情歸為命中注定，在自身無力改變的時候，祈求神明護佑，他們所能做的就是通過向上天祈禱，藉此逃脫災禍，獲取平安。

民間醫療行為的出現與政府防疫宣導力度不夠也有相當程度上的關聯，同時，越不發達的偏遠地區關於這方面的謠言信任程度越高，因為其醫療體系建設較城市而言較不健全，民眾的經濟條件也相對落後，在看到大城市內都因為疫病一團亂時，擔心自身所處環境無力對抗病毒，在難以獲得科學防疫方法時，地方醫學便會參與進來，拋開療效不論，對於民眾而言，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心靈安慰與寄託。

四、疫病之下的社會抗議與階級鬥爭

與2003年SARS時期相比，民眾所處的輿論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網路世界使得各種訊息魚龍混雜，讓人們應接不暇，也難以辨識。在新媒體時代，信息更迭速度變快，流傳的範圍也更廣，發布訊息者不論身份，也不需要證明其訊息的真實性可信度，通過技術拼接的方式，用虛假的訊息拼湊造假的視頻或圖片，讓假消息看起來更為真實。學者馬立德、李占一在《重大突發事件中謠言的特點、影響與對策建議》一文中指出，社交信息消費已經進入讀圖時代，據統計分析，當前70%的謠言都配有圖片，還有近五分之一的謠言是以小視頻的方式出現，通過字幕誤導民眾。當事實被重塑，謠言以更多樣化更狡猾的方式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官方媒體與權威機構必須提高公信力，及時發聲才能夠使民心安定，遏止謠言的擴散。

在這場新型冠狀病毒這場瘟疫大流行中，官方的前期失聲是導致謠言大量產生的重要原因。社交媒體的迅速發展打破了官方媒體對於訊息的壟斷，官方不發布訊息，不代表民眾無從得知，在面對疫情的恐慌面前，民眾的情感大過於理智，面對碎片化的訊息，失去了辨識的能力。在疫情前期，官方還未證實有新冠肺炎這一事實，但中國武漢市已經出現多例有相同症狀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部門發布了首次關於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稱“已發現27例病例，且這些病例系病毒性肺炎，但目前為止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多家媒體也對此通報情況做出報導。隨後有網友舉報稱有人在網路上發布不實信息，稱“X醫院已有多例SARS確診病例”、“確診了7例 SARS”、“Y醫院接受了一家三口從某洲回來的，然後就疑似非典了”等未經核實的信息，經過公安機關對發布訊息的8人進行調查、核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相關規定，公安機關對其進行了教育、批評。因為當時疫情剛剛開始，許多流傳的訊息還不夠準確，但最早傳出消息的這八個人中，至少有四位以上是專業的醫務專業者。在當時被冠以“造謠者”的名義的其中一名眼科醫生李文亮，在經受公安機關的訓誡後，回到崗位繼續工作，在接診過程中他發現確診病例的家屬也出現相關的發燒症狀，這讓他開始懷疑病毒存在著“人傳人”現象。1月8日，李文亮接診了一位82歲的急性閉角型青光眼患者，由於當時患者並沒有表現出染疫的症狀，李文亮醫生在接診過程中也沒有做特殊防護，1月10日起，李文亮和父母相繼出現咳嗽、發燒等症狀，並很快被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病例作為官方發聲機構的武漢市衛健委，在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3日、1月5日連續三次發布通報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和“醫護感染”，是否“人傳人”是民眾判定傳染病嚴重性的一個重要指標，這代表著疫情是否可防可控，自己被感染的風險程度有多高，在2020年1月15日，武漢衛健委表示，現有的調查結果表明，尚未發現病毒具有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武漢市疾控專家等官方機構在宣導新型冠狀病毒時，一直用“可防可治可控”等用詞安撫民心，也因如此，武漢百步亭社區於1月18日舉辦萬家宴，共計數萬人參與。1月20日，

時任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的鐘南山在接受央視訪問表示，“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肯定有人傳人現象”，當時已有14名醫務人員因護理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而受到感染。兩日後，中國國家衛健委承認已經出現人傳人及醫務人員感染，病毒存在變異的可能性。

在關鍵的傳染性問題上，能夠看到武漢權威疾控機關的言論混亂程度之嚴重，作為官方發聲平台，在前期的瞞報、誤報引起了民眾巨大的爭議，認為是官方的通報稱有限的人傳人導致民眾放鬆了對於疫情的警惕，也未能及時做好防護工作，官方的疏漏與後期疫情的井噴式爆發有著無可推託的關聯。在疫情的早期，被壓制的官方聲音，被隱瞞的真相，使民眾在民間流傳的謠言與官方的通告中來回搖擺，碎片化的信息被有意或無意的加工一番，就會在傳播過程中變形失控，諸如當傳謠者將自己偽裝成某醫院的醫務人員，在疫情之下，民眾自然而然對於權威人士的信任度更高，新媒體的隱匿性幫助造謠者偽裝身分，讓普通民眾一時間難以辨別。

而謠言得到官方的澄清也需要一定的時間，而當其被關謠時，可能已經在社會上傳播了一段時間，形成了一定的效應。權威信息的缺失導致被捲入網絡輿情的漩渦中的民眾情緒失控，心態失衡，疫情的複雜催生恐慌情緒蔓延，線上批評聲討不斷，甚至導致官民衝突激烈，情緒化放大了疫情的緊張，也弱化了科學防控的理性。

另外重要的一點在於，官方當時所關謠的“謠言”，又與後期被曝光的事實真相部分吻合，這在很大程度上讓謠言的可信度增加了。面對疫情人們具有普遍性的恐懼，當民眾對於疫情了解的越少，就會越相信謠言是真實的，而當民間話語沒有一個正當的管道得以表達，也無法獲知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的信息時，謠言就會由此滋生。通過新媒體的傳播，民眾接收到的大部分是來自身邊的親人、朋友的訊息，出於本能的信任，對所傳播的訊息的信任程度也會更高。

胡泳提出，謠言會作為一種社會抗議出現，群眾的不明真相是導致謠言越演越烈的重要原因，政府使用自身職權，用法律手段束縛壓制一些有一定真相但並不完全準確的信息，使得民眾不敢發聲，就像在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的李文亮事件，政府是否為了維持暫時的社會秩序，僅僅因為與真相不完全一致，就忽視出發點而判定為破壞社會穩定而濫用了職權，使得想發聲卻不敢發聲的民眾人人自危，如何保證民眾的言論自由權，仍然值得深思。為了自身的政績，政府也存在選擇性報導的現象，為了政績製造疫情可控的假象，而此時的民眾與其相信官方新聞媒體中的說辭，更多會選擇相信身處疫情中心的普通民眾所傳出的訊息，新媒體的即時性使得民間訊息的傳播速度高於傳統媒體，

也更加多元，原本在傳播鏈上就處於弱者的普通民眾，加上在疫情前期有過被官方媒體所“欺騙”的經歷，自然而然會對民間訊息的更加信任，而此時的民間訊息也使得不懷好意的謠言肆意生長，民眾深陷其中卻難以分辨了。官方媒體必須意識到，對於民間訊息的絕對封鎖是不可行的，唯有向民眾坦誠相待，滿足其信息需求。提高民眾對於謠言的感知力，及時發聲，緩解民眾的焦慮情緒，釐清政治與民生的關係，建立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任。

五、 新冠敘事過程中的去道德化

在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前期，一則與新冠病毒源頭密切相關的訊息通過社交媒體迅速席捲了中國大陸，並很快在民眾之間流傳開來，這則訊息提到“吃蝙蝠是引發新冠病毒的原因”，這則訊息不但看起來有理有據，甚至在微博和微信中的某些營銷號開始流傳吃蝙蝠湯的視頻和照片，視頻中的女子稱“蝙蝠吃起來和雞肉差不多”，這一事件一經面世便引起民眾的軒然大波，紛紛斥責吃蝙蝠或吃野味的人毫無道德底線，為了滿足自身的口腹之慾連累了整個國家的人民，帶來了嚴重的健康危機，當時也有研究指出，新冠病毒的“起源”或是“自然宿主”被高度懷疑為中華菊頭蝠，而理由僅僅是因為全基因組水平與在中華菊頭蝠中發現的冠狀病毒最為接近（基因相似高達96%）。傳的沸沸揚揚的消息加上專家的“認證”，人們已經忽略了何謂高度懷疑，單純將箭頭指向那些食用野味的“惡人”。武漢人民成為“病毒攜帶體”的代名詞，甚至被視為洪水猛獸。對於食野味者的歧視也並非沒有由頭，2003年發生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嚴重傳染性疾病在當時被認為的源頭也是來自被人類食用的野味果子狸，鑒於SARS經驗，人們本能的認為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同樣來源於野味。

這則謠言的時間點處於中國新年之際，面對突然出現又未知的病毒，民眾過年的喜悅被破壞，人心惶惶，人們期盼找到一個突破口，對這種病毒有一些了解，也在尋找一個發洩點，將恐懼、憤怒發洩出來，此時，這些所謂吃野味的人就被輿論推了出來，輿論將病毒源頭指向他們，於是民眾就將目光聚集在他們身上，將食野味者拉入輿論的漩渦中，也從價值取向層面，將新型冠狀病毒建構成他者的疾病，訴諸於道德層面，因為食用野生動物的人才得此疾病，認為吃野生動物這種錯誤的生活方式，觸犯了道德的禁忌，他們之所以染疫，是因為他們做了違反道德倫理的事情，由此受到懲罰。

這樣的輿論導向讓民眾忽視真相的存在，也助長了民族內部的衝突，紛紛跟風指責食野味者，哪怕之後的研究為蝙蝠正名，稱蝙蝠與人類之間還存在著複雜的中間宿主，但這則謠言在中國大陸範圍內的傳播深度已經極其深遠，甚至將敵意從最開始幾個食野味者上升到整個武漢市民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

對武漢民眾避之不及，甚至連武漢的快遞都不敢簽收。在疫情爆發的這樣特殊時期，排斥食野味染疫者，上升到排斥與武漢關聯的人和事物，這樣的想法引發了民眾大量的情感共鳴，互聯網群體是以情緒、觀點、價值認同等為出發點的鬆散連結共同體，對於疫病的恐懼和對帶來災難的食野味者的情緒推動者謠言的加速擴散，在群體傳播中產生大規模的群體效應，形成了壓倒性的網絡輿論。

但事實上最初在網絡上流傳的所謂“吃蝙蝠”的視頻和照片來自2016年一個叫做“環球夢遊記”的旅遊節目，視頻中女主持人食用的是帕勞當地的特色食物蝙蝠湯，而這裡的蝙蝠不屬於野生動物的範疇，而是帕勞當地人所飼養而成的果蝠，果蝠是帕勞乃至整個東南亞都食用的一種食物，但這樣的闢謠信息在當時知道的人遠遠少於知道謠言的人。

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者而言，他們被賦予強烈的異己色彩，健康的民眾將感染者視為異類，甚至在疫情最開始時視為沒有道德的惡人。但在疫情隨著人員流動擴散至全國乃至全世界時，加之政府官方部門將“食野味未必是新冠的源頭”，“關於新冠的源頭複雜難辨”這一事實向民眾展開宣導，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敘事發生了轉變，關於道德化的標籤被淡去，民眾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身的防疫問題上，對染疫者從鄙視與敵意轉變向同情發展，抗疫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整個民族同仇敵愾抵禦病毒的壯舉，此時也有相當數量的醫務人員、警務人員等公職人員或志願者主動衝在第一線，而當他們不慎染疫時會被民眾以英雄相稱，為了國內的疫情平穩，全國民眾拋開最初的偏見，也將染疫這件事去道德化。

但在中國的國內疫情流行已經結束，國內病例清零後，國外疫情仍處於大爆發時期，此時民眾對於從國外回國而被檢測出攜帶病毒的染疫者，又貼上了道德的標籤，網絡上甚至出現了以“回國給國家添麻煩”、“千里投毒”等極度不友好的言論，此時從境外歸國的染疫者又被建構成他者，被一些不理智的

民眾所排斥。另外隨著國外疫情一直沒有得到好轉，中國境內的民眾也難以完全保證安全，一些民眾由於接觸過境外移入的冷鏈等被污染的物品或人，再次染上病毒，但由於病毒的潛伏期較長，在他本身還沒有察覺的時候，又與他人再接觸，而被確診後被公布足跡時，民眾亦會給他扣上“沒事亂走，不遵守防疫規定”的罪名，成為眾矢之的。

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染疫者，會隨著社會狀態、網絡言論的變化，而被賦予不一樣的稱謂，畏懼病毒的普通民眾將他們的染疫指向道德層面，但卻忽略了在這場傳染病大流行之下，眾人皆是受害者，謠言的加入也使得染疫者在去

道德化這條路上仍然走的艱難。

陸、結論

新媒體時代下，人人都是發聲者，當各種訊息魚龍混雜時，如何辨別其真偽性，讓它成為普通民眾向政府發聲的正當手段，而不是讓惡意的虛假訊息混淆民眾視聽，破壞社會穩定。本文以COVID-19（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大流行為背景，搜尋中國大陸COVID-19相關之謠言作為文本分析對象，對其進行解讀，並對其背後所指向更深層意涵進行研究。

當提到謠言時，常常想當然地認定它是錯的，是負面的，但其實深究謠言的背後，反映的是普通民眾由於缺乏相關經驗與知識，對於此類謠言缺乏冷靜的判斷力，以及面對突如其來且來勢洶洶的疫情有本能且未知的恐懼，希望通過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規避風險。本文研究發現，當民眾所受之教育程度、所處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時，為了規避風險，往往指向民間醫療行為，藉此逃脫災害，哪怕不論功效，也為尋求心靈慰藉。而當官方權威機關失聲時，謠言便會就此滋生，民眾對於官方的信任程度降低，轉而相信謠言的真實性，就學者胡泳的觀點而言，謠言會作為一種社會抗議出現，當正常的溝通管道變得不正常，繞過正常管道就成了民眾自然的選擇；謠言就是這種「繞道」的體現之一。謠言是小道消息，但更近似於個人情緒感受的一種表達，也表達了試圖認知自身生存環境的人們的憂慮和困惑。在疫情之下，透過民眾的心理去看待謠言的產生，也許會更具客觀性。在新冠的敘事過程中，也能夠看到民眾對於染疫者的態度轉變之過程，如何科學的看待染疫這件事，如何將其真正的去道德化，仍與官方消息的透明化與科學宣導脫離不了關聯。

疫情之下謠言的出現，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失衡與抗議，民眾對於政府的缺乏信任，政治干擾民眾生命健康等等，如何利用主流媒體的引導功能，引導民眾正確辨識虛假訊息，也能夠從謠言中獲取民眾的真實需求，而非強勢壓制，這正是未來需要思考的問題與方向。

參考文獻

- Knapp, R. (1944). A psychology of rumo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 (1), 頁 22-37.
- 卡普費雷 (1991), 《謠言》(鄭若麟、邊芹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原書Kapferer, J. [1990]. *Rumors: Uses, interpretations, and imag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杜兆倫 (2018), 《謠言分藍綠?政治傾向與社群媒體謠言傳播之關聯性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曉虹主編 (2008), 《社會心理學》,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周曉虹 (2003), 〈傳播的畸變——對“SARS”傳言的一種社會心理學分析〉, 《社會學研究》第6期, 頁43-54。
- 周裕瓊 (2008), 〈1998-2008：艾滋謠言在互聯網上的演變與傳播分析〉, 《中國傳媒報告》, 第3期, 頁78-86。
- 胡泳 (2009), 〈謠言作為一種社會抗議〉,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九期, 頁 67-94。
- 施誠、倪娜 (2020), 〈西方學術界重大傳染病起源地研究的歧見和偏見——以黑死病、美洲天花、梅毒和1918年大流感為例〉,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第35卷, 頁181-204。
- 馬立德、李占一(2020), 〈重大突發事件中謠言的特點、影響與對策建議〉, 《新聞戰線》, 頁 9-11。
- 殷曉椿 (2014), 《基於新媒體的疫情謠言傳播個案研究》,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公共管理專業碩士論文。
- 楊慧瓊 (2011), 〈謠言、大眾傳媒和國家價值取向——一項對中國愛滋病敘事(2003-2009)的話語分析〉,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16 期, 頁 163-192。

